

日 本 精 神

—— 一个巨人之谜

(美) 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 著

马 泉 孙健龙 译

日 本 精 神

〔美〕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 著

马 泉 孙健龙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4225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202千字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014-158-6/C·0009 定价：2.40元

印数：00 001—14 800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日本民族.....	(4)
一、最奇特的一对：日本和美国.....	(4)
二、日本的情感与理智.....	(21)
第二章——成长中的日本人.....	(38)
三、一切源于家庭.....	(38)
四、教育竞争.....	(50)
五、女人的地位.....	(67)
六、“我的家”.....	(80)
第三章——社会动物.....	(96)
七、大众与阶级.....	(96)
八、自我控制.....	(108)
九、排外心理.....	(117)
第四章——工作与力量.....	(133)
十、信息社会.....	(133)
十一、政府机构和官僚.....	(147)
十二、工业成果.....	(168)
十三、妈妈、爸爸与机器人.....	(189)
第五章——展望.....	(211)
十四、生存的本领.....	(211)

序 言

自从日本开始作为国际事务中一个重要因素出现以来，英国不乏日本及其日本文化问题的卓越研究者。阿瑟·弗利考究的译本和乔治·桑色姆爵士对日本历史的启发性探讨，虽然只是两个最显而易见例子，却足以在西方学术界的日本研究史上占据里程碑地位。当代的英国学者继续在韦利和桑色姆等前辈开拓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当然，英国一些现代日本问题学者的工作未免有些玄妙，有时似乎只是为了炫耀作者的知识水平，而不是为了给读者以帮助。不过，任何题材的学术文章都存在这种现象，远为重要的是，今日英国任何有此兴趣的读者都可以获得大量关于日本问题的精辟而见解独到的分析文章。

相对而言，英国人往往不善于利用自己手头丰富的、关于日本的专门材料。我以为，这多半是由于日本的振兴来得过于迅猛，出乎那些自诩为日本问题专家的预料，而今日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英国人除了从新闻媒介中得到的之外，对日本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人们很难形成一种明智的对日政策方针，而这种方针却是联合王国急需奉行的。

日本问题研究的这种状况不仅仅局限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我可以断言，欧洲大陆的情形更糟。简言之，在整个西方世界，那些在其他方面信息灵通的人们，对于目前非共产党国家中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

鉴于这种情况，我早就断定，即使我能做一点工作，它对于已有的大量日本问题的杰出的英文学术著作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看来，目前最需要的是一部关于当今日本精神生活和社会体制的参考书，才能使那些忙碌、聪明而又认真的西方人发生兴趣，他

们从前对日本的了解真是微乎其微。

我就尝试着写下了这样一本书。基于这种意图，我也就竭尽全力避免犯传说中的那个错误——也就是传说中害得一位美国孩子写下“我想知道企鹅，可这本书介绍得也太多啦”的那种枯燥繁琐。具体说来，我力求避免将这部学术性工具书当作注脚，将提供给读者的历史细节的数量限制在我认为确实有助于理解当代日本的范围内。

我避免引证过多，不是为了掩盖我从日本问题前辈学者和其他人那里得益非浅这一事实。我这部书酝酿了足有40年时间，其中难免吸收大量文章著作和统计资料中的事实、数字和观点，要把这一切都罗列出来，需要巨大的篇幅。同样，要把几十年来帮助我形成了自己对日本的见解的几百位人士都罗列出来，也不是件容易事。但是，有几个人物和机构对我的影响和帮助非同小可，我必须写下来。在非日本人中，按我结识他们的先后秩序，有——

哈佛大学的伊梅里特斯·埃德温·O·赖肖尔教授。我在他主持的美国陆军学校中开始学习日语。我猜想，他对我大概是一无所知，可就是他，使我首次认识到，日本人并不比西方人神秘，只是不相同罢了。

前耶鲁大学教授弥永千利世先生。他以其出色的清晰明澈，使我了解了日本错综复杂的历史。

现任日本《中心》杂志的主要顾问伯纳德·克雷舍。他与我在《新闻周刊》共事14年，不仅慷慨地让我了解了你对日本问题的看法，还给我引见了许多当代日本举足轻重的人物。

还有纽约的“日本协会”。它那些能干而不知疲倦的理事们——特别是戴维·麦克伊奇伦和川岛琉璃女士还有若干其他人，长期为我提供有价值的现代日本重要人物和几乎日本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情况。

最要感谢的那些日本人，我大多会在此书中用某种方式提到。我希望那些没有被提及的人能理解，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害怕我笔

下一些东西会使他们感到难堪。然而，我打算提一下这些年来一直帮助着我的组织，希望不会使它们不快：日本外务省、通产省，纽约的日本情报中心，日本的国外新闻中心和日本国际大厦。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我的代理人米拉尼·杰克逊，是他的热情使得我的著书计划付诸实施。还要感谢我的编辑乔尼·埃文斯和玛乔里·威廉，他们大大改变了编辑与作者间的“胡萝卜加大棒”关系，始终只给我“胡萝卜”。在此，我为他们所给予的这种优待及其一贯有价值的意见，向他们致意。

1983年11月8日于康涅狄格州

第一章

日 本 民 族

一、最奇特的一对：日本和美国

我坐在书桌旁写这本书时，桌上放着一只小小的铜塑像。这是一个蹲伏着的小动物，样子有些象猫，却又有中国龙那样方正的头部和宽大如扇子一般的尾巴。过去35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看上它一眼，而每每看着这个神秘的小塑像，我总觉得有一丝犯罪感，因为尽管我喜欢这玩意儿，它却并不真正属于我。曾几何时，它也一定和其它此类塑像一样，是日本那些富商、业主们深宅大院外铁栏杆上的装饰品。1945年9月，东京西城瓦砾似海，就是在一片废墟中我捡到了这个塑像。

用“瓦砾似海”来描绘废墟并不新鲜。但只有这个词能准确地形容出我初次看见日本的那个情景。当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密苏里”号战舰上接受日本天皇政府投降刚刚几天。那时候，在东京驱车方圆几里之内所能见到的只是大堆小堆的瓦砾。在这空旷荒芜的地方，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居住繁衍，然而现在一片断壁残垣中唯一显眼的东西，唯一能稍稍使你回想起这里曾是人居之地的东西，是偶尔碰上的几只保险箱。它们凄凉地记载着那些商人和住户们徒劳的谨慎和节俭。这些人或许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时日本的情景令人感到无比的伤感和恐怖。一次我和麦克阿瑟参谋部的一位少将一同驱车穿过东京城。途中他突然转过身来用缓慢温和的佐治亚口音对我说：“中尉，你知道，我没有理由喜欢

日本人。但我自己也来自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所以有时禁不住同情这些日本人”。

即使你两、三年前曾在南太平洋岛的森林里参加过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也很难不对1945年末的日本产生同情。除由于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免遭轰炸的古都京都市以外，所有日本其他主要城市均被美国轰炸机无情地捣碎。日本全部城市建筑物中有40%被摧毁，近70万日本老百姓（日本总人口为7,200万）丧生。然而，这仅仅是日本所遭损失的一部分。战争结束后的第三个月，我在东京北郊一个村庄看到一支送葬队，悲哀的人们举着一张放得很大的照片，上面是一个胖乎乎的、神色有些迷茫的青年，他是二次大战中身亡的130万日本士兵、海员及飞行人员中的一个。

美国占领军的进驻“仁慈”地结束了轰炸和伤亡，然而远远没有结束日本的苦难。日本的经济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破坏不大而幸存下来的工厂由于缺乏原料而被闲置，各种燃料都十分匮乏，寥寥无几的出租汽车靠装置在车尾上那笨拙的炭炉来启动行车，公共建筑物内没有取暖装置。战后第一个寒冷的冬天到来时，一个日本家庭若全家能在微微发热的木炭火盆旁挤作一团，就会感到很满足了。

最可怕的是饥饿。由于食品极端短缺，美国士兵用几盒份饭或香烟就可以换到人们珍爱的传家宝或者买到一个女人。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我的一个熟人，是日本一家很大的制造公司经理，他回忆说，在那个冬天里曾有一次他整整一个星期不能为自己和全家搞到一点儿食品。他在日本人中算大个子，珍珠港事件时他体重近190磅，到1945年秋天就只有105磅了。

由于这样挨饿受冻，日本人比平时更容易得病，而一旦得了病，又几乎得不到任何医治。一次，我驾车经过距东京70英里的一个农庄，遇到一位正在那里进行某种神秘调查的美国反情报机构的上尉。他告诉我，这里正流行霍乱，但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医疗措施能够用来治疗病人及隔离他们的亲属和邻居，只是当这位军官通过

十分非法的手段从美国军队的一个卫生队“征用”到疫苗后才彻底控制了霍乱的流行。

生活在这个一片废墟、即使在战前也远比美国贫穷、技术落后的国家里，大多数美国士兵心里都产生了共同的想法。记得我时常听占领军中有人用怀疑的口气问道：“天知道这些日本人怎么竟会认为他们能同美国较量？”而且在我认识的占领军士兵中，没有一个人想象过日本有朝一日会向美国提出挑战。1945年底，林赛·帕拉特在《纽约时报杂志》星期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达了当时普遍的看法：日本经济永远也不可能出现“骤然增长”……，前景是“把日本恢复成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小国”。

我在这里追忆起1945年日本贫困潦倒时的情况，是因为我认为这些情况对理解今天11,800万人口的日本是很重要的。拿我来说，当年在废墟一片的东京经历使我对有关日本的事情一辈子都感兴趣。1946年当我突然由一个军官和成年人变为耶鲁学院三年级学生时，我放弃了战前所学的“英国文学”专业而开始攻读“东方研究”专业的学位。自那以后，日本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朝鲜战争中我第二次服役又回到日本，从60年代中期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这个国家。而且由于我是美国一家颇有影响的出版社的代表，在访问中常常得到不少方便。用艾奇逊的话说，从某种意义上，我在“亲眼看着当代日本的诞生和兴起”。日本天生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小国，而今天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非共产党国家中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大国之一。

今天的日本已是如此繁荣兴盛，有时我竟感到很难将它与1945年时那个心身都处于崩溃状态的日本民族联系在一起。如果连我都难做到这一点的话，我更要怀疑那些没有经历过日本低潮时期的人们是否能完全理解日本人自那以后所取得成就之巨大。实际上许多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同样不懂这一点。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中，没有人能够真正欣赏上一辈在35年里把日本这一堆多山而又无甚重要自然资源的零散小岛，建设成为世界

上第二经济强国所付出的艰巨努力。

如果连日本的年轻人都受到指责，说他们不懂得为什么日本社会会发展到目前的程度，那么大多数美国人也不懂这一点便是可以理解的了。然而，并不能因为“可以理解”而不认为它是一个弱点，而且我认为，目前美国人不了解日本、不了解其所以取得成就的实质，是很危险的。

这一危险并不在于美国没有研究日本的专家。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现了一批日语语言学家和颇有见识的从研究日本电影到日本经济史的各种日本问题专家。然而除少数情况外，这些专家在制定日美关系政策过程中没有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工业和政治决策者们身旁即使有专家，也从来不使用他们。相反，决策者们往往在不征求专家意见而又完全不了解日本及其人民的情况下贸然行事。

特别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决策者以及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日本的误解，无论从性质上还是从这种误解可能造成的后果上，都不同于我们已经表现出的对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国家情况的的不了解。如象林登·约翰逊、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这样的总统可以只会讲英语，对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只具有最肤浅的知识，却能应付世界上大多数事情，而且可以应付得很好。德国人、俄国人、沙特人或尼日利亚人的思维过程或多或少都和我们十分相似，因此我们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在商业和外交上同他们打交道一般都比较顺利。

然而，在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这一鸿沟就大得多了。只有少数不引人注意的专职研究日本的美国人熟悉日本，而这些人有时是出于对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的疯狂迷恋而研究日本的，显然那个已消失的世界与当今日本的联系就如同伊丽莎白女王时的英国与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之间一样相似之处甚微。但除这些人外，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毫无所知。由于我们想象不出他们与美国人究竟有何不同，我们也就不能够按日本人的逻辑思维方法去思维或掌握决定日本人行为的价值观念。

事实是，日本人的逻辑和价值观确实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由于美国大部分人不愿认识这一点，并不断莽撞地试图去影响日本及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从而常常犯错误。这不仅仅在众所周知的两国间的经济竞争方面，而且在文化、政治和社会事务等方面都犯下不少莽撞的错误。

很显然，在与日本人打交道中犯最严重错误的美国人，是那些既缺乏有关日本的知识又看不到这种知识之必要性的人。不久前，一位代表美国一家新闻托拉斯常驻东京的美国人，向我讲述了他的公司在日本屡犯错误的可悲故事。七十年代中期，有一次他的美国老板们提出与一家日本主要出版公司合资经营的建议。初期谈判长时间没有结果，于是该公司最高领导人员为了拉关系，决定飞往东京，与那家日本公司领导进行一次直接接触。这一行为在美国人看来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我这位朋友了解到这一计划后，就极力敦促公司取消这一决定。他解释说，在日本，所有的总经理都是事先经过其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周密考虑并得到同意之后才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我的朋友还提醒他的老板们说，这一过程一般要经过二、三年时间，任何想阻挠这一过程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但是，美国的公司总部对我朋友的警告根本不相信。总部的官员们很不耐烦地指出，任何出色的商人不论是哪国人，都绝不会如此行事。于是公司领导便出发来到东京。日本公司的首脑们热烈地欢迎他们，慷慨地招待他们，并有礼貌地拒绝做出任何承诺。结果，使美国经理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这一交易终究没有成功。

五花八门的诸如此类错误点缀着日美关系史，而且造成的损失往往要比公司丧失部分利润严重得多。在几年前举行的一个美日关系讨论会上，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米歇尔·布卢门撒尔苦着脸指出，无论什么时候他向福田纠夫首相建议改变日本的政策，都从来没有得到过期望得到的肯定答复。福田总是回答说，这一想法听上去很有趣，你应该向四位主要负责经济事务的内阁官员宣传你的建

议。布卢门撒尔与许多美国人不同，他比较老练，不会马上下结论说日本人是在兜圈子。然而他也很明显地把日本政府的基础即集体决策过程视为一种固有的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性机制。这一点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布卢门撒尔任职的卡特政府在力图使日本经济政策做出重大改变方面建树甚微。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日本及其文化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的美国人，犯这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难以原谅的是那些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对日本人的生活和心理也常常表现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不理解。几年前，一位美国驻东京的大使，经过刻苦学习成了有日本政治界方面专业知识的职业外交官，他以肯定的口气对我说，如果不是由于日本的贸易限制，日本会成为美国大型冰箱的很好市场。听了他的话之后，我感到，这位大使虽然在日本呆了这么多年，但肯定从来没有对普通日本人的厨房扫过一眼。事实上，日本人的厨房根本没有地方放下一只美国式的冰箱。

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例子，过了几年，我与后来驻东京的美国大使讨论起为什么美国汽车制造商在日本卖不出汽车。我指出，从底特律三巨头汽车公司之一的一位总经理曾经表示的态度中，可以看出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这位直率的经理曾宣称他的公司“根本不在乎”日本市场。此外，我还告诉大使，日本人同英国人一样都靠左边行车，如果美国汽车公司把他们运往日本的汽车样品的方向盘装在右边，可能会有好处。我说完后，大使冷冷地扫了我一眼。很清楚，他把我看作一个美国民族的背叛者。他指责我所说的纯粹都是受日本人影响的糊涂话，真正捣蛋的还是日本政府的贸易限制。

上面提到的两位大使都养成了一般美国人所具有的可悲习惯，即把过错推到日本人身上。然而，实际上这一切正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当然他们俩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这自然也是一般人际关系中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人们谁也不愿正视自己的缺点。在日美关系

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作怪：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使许许多多美国人难以承认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居然还会犯错误。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优越感明显地反映了十足的、旧式的种族主义。白人本来就有把非白人视为“不懂法律的劣等人”的历史传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又不断受到铺天盖地的反日宣传，使这一种族歧视传统在美国大大地加强了。目前在美国还有一部分人不能相信那个“小个黄种人”民族除了比美国人奸诈外，还能在什么别的方面胜过美国人。为数稍少、但对健康的日美关系同样有害的是那些中国爱好者们——比如，亨利·基辛格。他第一次访问北京回来后不久，便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滔滔不绝地大讲与象周恩来那样既敏锐又老练的人打交道是如何地比与同日本领导人那样的“经济动物”来往更令人愉快。美国人对日本看不起的态度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出于一种不大自觉的感情，即对日本的占领时代所形成的那种“老大哥知道最多”的态度，一直残留至今。

我承认，二次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是历史上此类占领中最成功的举动之一。尽管麦克阿瑟总部成员拥有热情和自信心而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专门知识，他们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成功地从根本上重组了日本社会，从家庭生活到公司法，几乎日本人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美国武士”们彻底地加以改变了。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军事优势显示了他们道德和政治上的优势，美国的占领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日本是一次解放——一个外界力量强加的革命给日本人带来了一个更平等、更有活力的社会。但美国对占领日本的意义并不很清楚。当时许多风华正茂的占领军人现已成为美国各个领域中的坚分子，那时他们象导师一样地对待日本人，而我相信今天的许多美国官员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仍在不自觉地这样做。

美国人对日本的一窍不通，再加上美国人具有惯于把自己的社会看作是其它所有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的偏好，已引起了极端严重的后果。多年以来，美国政府在对待日本政府时采取了既傲慢自大又漠然无视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尼克松政府执政时首次得以充分表

现。当时，白宫做出了一系列直接影响到日本利益的决定（其中包括美元的实际贬值、承认共产党中国），都没有与东京进行任何协商，甚至没有事先通告日本人一声。从“尼克松震惊”开始之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旁若无人地断定，无论何时美国和日本的利益发生冲突，日本都应该屈服并做出所有让步。

这种态度当然是在任何形式的外交谈判伊始，谈判双方所持的标准态度。但是美国对日本提出的某些要求是美国在与其他大国关系中绝对不会考虑提出的。例如，吉米·卡特曾派一个使团去日本向日本建议，为了减少日方长期的贸易顺差，日本应从根本上重新组织其国内经济。卡特丝毫也没有感到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妥。

卡特政府向日本提出的这个建议，与乔纳森·斯威福特提出的若爱尔兰想要解决饥荒，农民就必须卖了孩子换面包的所谓“有节制的建议”，虽然不属一类，但却是同样地简单和仓促。二者的差别只是斯威福特故作荒谬，而吉米·卡特及其使者却极端严肃。

迄今为止，美国官员们对日本一贯采取的这种专横腔调还没有造成什么真正灾难性的后果，根本原因是因为日本人只驳回美国人实在太蛮横无理的要求，而且常常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以避免双方意志的最后较量。当代日美关系使人回忆起已故著名耶鲁足球教练赫曼·希克曼对待耶鲁学生的方式——“既不能让他们得意忘形，又不能让他们翻脸”。这是希克曼的原则，又恰恰是近十五年来日本政府对付美国政府的办法。

对两个盟国来说，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打交道显然是不够理想的。而且，日本和美国的这种关系能否无限制地如此继续下去是令人担忧的。如果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继续增加，那么美国人必然会越来越烦恼和愤怒。而且如果要求日本做出的代价比以前更为沉重、更为痛苦的让步，那日本人的反抗情绪就会越来越强。最后，这两个同步增长的过程就会动摇两国目前的亲密关系，而这将会给美国造成难以承负的危险。

令人不愉快的是，如前所述，仍有大量的美国人不理解或不承

认日本与美国结盟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1977年秋，由于日本与美国贸易中出现了90亿美元的顺差，卡特政府几乎每天都谴责日本。当时日本负责对外经济事务的国务大臣牛场信彦便飞往华盛顿试图缓和局势。在访问期间，牛场与美国参议院中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私下举行了会谈，几周后他的一个助手辛酸地告诉我，在会上大臣被驳斥得措手不及，人们告诉他：记住，大臣先生，美国不需要日本，而你们倒真的需要我们。”

除了令人难堪和缺乏起码的礼貌外，这一说法反映出不可原谅的无知。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保护及美国市场的依赖极大，这十分明显，根本就不需要特别指出。底特律和匹茨堡吃尽日本的苦头，这也是事实。然而，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安全在多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日本，这一点大概也不必向参议院的先生们特别指出吧。

任何一个美国参议员都应该知道，比方说，年复一年，日本在世界上始终是美国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农产品是美国至今出口中最有销路的产品。事实上，正常年景日本一般购买美国全部农产品出口的15%以上，这比所有其他国家都要多出两倍多。而且用于为日本生产粮食的美国土地也越来越多，超过了日本自己生产粮食的土地面积。

每个美国参议员还应该知道，日本还是美国煤炭和石油的潜在的重要市场。实际上，只要国会废除禁止阿拉斯加石油生产者在日本出售原油的愚蠢法律，美国与日本进行贸易时出现的持久性赤字的很大一部分就可一笔勾销。该法律使那些石油生产者只得把大部分石油销往美国东海岸，其价格比从墨西哥或委内瑞拉进口等量石油要高得多。

再者，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只是两国经济必不可少的相互依赖的一个方面。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日本作为两个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经济的国家都受到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的威胁，前意大利驻联合国大使费雷东·霍维达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之为“无秩序的工业化”。

霍维达所说的“无秩序的工业化”，是指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生产成品能力紊乱地增长，近些年来在发展中国家中，这一进程尤其明显。它们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一些不久前还只是原始经济的国家正在成为世界市场上工业品的强大竞争对手。

在美国，这一事实至今还没有引起明显的注意，然而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却已日趋明显。两、三年前我在中东旅行，发现南朝鲜的小汽车与“奔驰”、“福特”和“丰田”一同在阿曼和巴林的大街上夺路而行时，我还很惊奇。几个月之后在东京，当我与日本一家钢铁公司的一位推销员提及，由于日本竞争美国钢铁制造商在本国市场上不得不廉价出售产品而感受到的悲苦时，他苦笑着说，“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们日本人对南朝鲜的钢铁也开始有同样的感受。卖到这里的现在还不多，但楔子已经打进，从现在起，几年之后就会给我们，还有你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南朝鲜当然只是新兴工业强国之一，而且很明显将会出现更多这样的国家。从造船到某些人造纤维等各个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已有足够的制造厂可以生产出远远超出世界市场能够吸收的产品。而且由于第三世界的工厂较新，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他们在这些领域就更有竞争能力。同样，似乎很清楚，不论美国还是日本都不能指望在这些只靠传统的、相对来说非尖端技术的工业内无限期地维持它们一度曾有过的主导地位。

日本经济的经营者的中大部分，以及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对这个挑战只有一个明智的回答，即日本和美国都必须减少对传统工业的关注，而应围绕高、精、新技术重新组织各自的经济，因为在这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形成竞争力。

但是，假定两个国家都决定开始执行这一政策，又会给日美关系带来一整套新压力。很可能就是将经济战的战场从汽车和电子工业转到遗传工程和先进的信息系统方面。而且由于新的生疏的工业模式，不可避免地会给日本和美国同时带来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紧张态势，两国政府随后就会发现，将来他们会比过去更多地处于不和

状态。

所有这些都使日本和美国刻不容缓地需要在经济领域进行比以往更为密切的合作。如果不这样，日美同盟关系中的压力会最终支撑不住，后果将不堪设想。其实，对牛场先生说来是痛苦的事，反之亦然，因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持久发展，对美国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

说日本对维持我们的国家安全起着关键作用，许多美国人都不会相信。多少年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公开抱怨日本人在国防开支上不承担自己份内的责任。里根政府入主白宫之后刚刚六个月，就忠实地遵守这一传统，发展了一份国防部研究报告公开嘲弄日本，说“无论运用那种军费分担计算方法”，在所有美国盟国中日本都名列最后或倒数第二。

华盛顿再三再四地以这种方式教训日本人，使得许多美国人深信日本今天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它无偿地拥有军事保护。这不可避免地使大为恼火的美国商人和缺乏洞察力的时事评论家不时充满义愤地质问，美国为什么要大把大把地抛钱去保护那些自己都不愿意保护自己的人。

对此问题简短的回答就是，我们别无选择。没有日本提供给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我们最先进的太平洋基地就会远离亚洲大陆，使我们几乎不可能给我们的亚洲盟国以任何实际帮助，也不能在这一区域真正地遏制我们的敌人，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日本军事上如何微弱，从根本上说它保持着亚洲的势力均衡。

要试验一下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只需要看看当前东亚的局势。假设拥有巨大的工业和技术力量的日本，不是美国的盟国而选择与苏联，或与北京的一个反美政府建立同盟关系。那么，美国在亚洲问题上的发言权就会削弱到只能悄悄地低语几句，而对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就会难以想象地加大。

美国决策者们一般认为，日本永远不会离开美国核保护伞的底